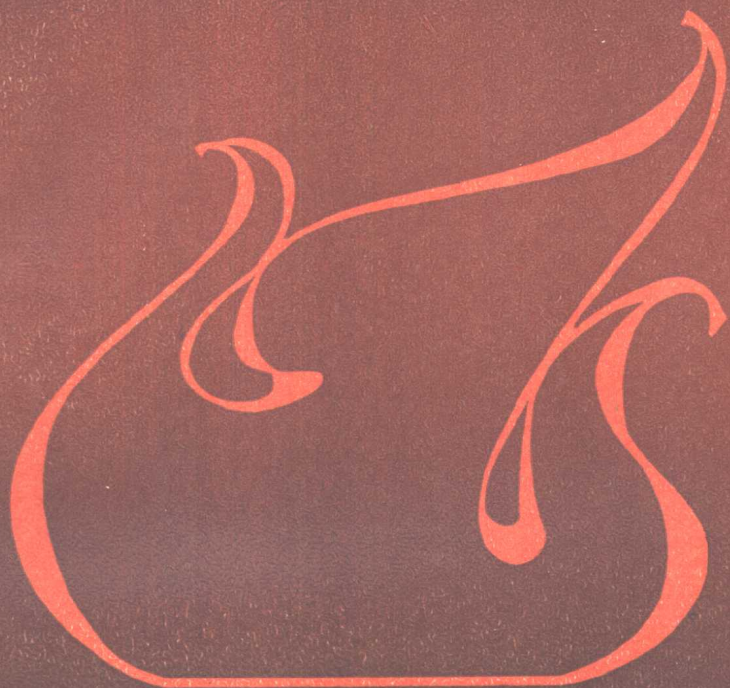




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

1919 — 1949

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

(1919年5月—1949年9月)

BAB7/10

学 林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甘晓培

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

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
青年运动史研究室

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代理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11,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书号 11259·007 定价 1.50 元

主编：

王 敏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绥方	张惠英	任武雄	李华明	林信泰
施 煜	俞乐滨	柳淑卿	顾静专	蒋志彦

前 言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六年前，为了加强对青年的革命传统教育，我们在中共上海市委、团中央和团上海市委领导下，开始征集上海学生运动史资料。在编辑出版《春天的摇篮》（中国青年出版社）、《1945—1949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青运史资料》丛刊十三辑的同时，组织力量搜集资料，编写了这本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比较完整的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力求科学地反映上海学生运动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第一，与学运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大事。第二，学运高潮中重大斗争资料，力求齐全完整；学运低潮时深入细致争取群众的“小事”，也没有忽视。第三，学运中的英雄和代表人物的事迹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发展资料。第四，重大学运斗争中有代表性的宣传资料要点。第五，上海学运的领导核心——共青团及其它名称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资料。同时，也收集了其它在学运中有影响的全市性的青年组织，如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活动资料。第六，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团中央、中共上海市委、团市委等党、团领导机关或负

责人对学运的重要指示要点。第七，与学运有关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其它群众运动的大事。第八，作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有关国民党破坏学运的重大措施，及其御用青年组织的重大活动资料，也有所反映。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五四以来出版的六十多种报刊和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并访问了一百多位各个历史时期的上海学运领导人和亲身参加者，参阅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同时，也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参加本书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丁宁、王敏、王绥方、王继洪、史济奎、冯晋华、刘大立、刘心勇、许玉芳、华路、汪维范、陈颀、居桐、余政伟、林晓军、林信泰、张振民、张深、张培强、张荣华、赵帼萍、赵剑敏、赵绵池、杨人卫、周琪、姚璋剑、信洪林、柳定、郭爱娣、施煜、徐跃、唐崇崎、高乃义、梅建华、葛子厚、雷海燕、缪君奇、阙伟民等。

上海学生运动历史资料极为丰富，我们掌握的还很有限，本书只是一份初稿，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希望读者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1)
五四序曲——中国的早期学生运动	王敏 (1)
一九一九年	(18)
一九二〇年	(34)
一九二一年	(43)
一九二二年	(47)
一九二三年	(54)
一九二四年	(60)
一九二五年	(71)
一九二六年	(84)
一九二七年	(95)
一九二八年	(103)
一九二九年	(109)
一九三〇年	(119)
一九三一年	(128)
一九三二年	(147)
一九三三年	(158)
一九三四年	(164)
一九三五年	(169)

一九三六年	(182)
一九三七年	(199)
一九三八年	(210)
一九三九年	(220)
一九四〇年	(228)
一九四一年	(233)
一九四二年	(238)
一九四三年	(241)
一九四四年	(243)
一九四五年	(246)
一九四六年	(254)
一九四七年	(263)
一九四八年	(281)
一九四九年	(297)

五四序曲

——中国的早期学生运动

王 敏

伟大的五四运动，吹响了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揭开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扉页。在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中，学生运动充当了急先锋。学生运动的高度发展，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必要历史条件。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在五四时期，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学生群众能够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五四运动中发挥先锋号角作用，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本文就此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学生群体的形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开始，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的一千三百年里，

实行的都是科举制度。清朝政府办的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实际上都是科举制度的组成部分。生员入学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科举资格。学习的内容是：五经、四书、性理、习字等科。民办的书院起初是进行自由讲学和钻研学问的，后来多变成官办，转为科举制度服务，实际上成了科举的准备或补习机构。

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便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仅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的侵略，同时还进行文化侵略，既建教堂又办学校。外国教会在我国办的第一所学校，是1843年从马六甲迁到香港的英华书院。当时比较有名的学校有：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霭尔特塞于1844年在宁波创办的女子学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创办一所男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成为之江大学。在上海，当时比较有名的学校有：美国圣公会于1846年创办的崇信义塾；美国基督教怀恩堂于1847年创办的怀恩中小学；圣依纳爵天主堂于1849年创办的读经班，1850年扩充为徐汇公学；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50年创办的俾文女塾；英国教会于1850年创办的英华学塾；美国北长老会1850年创办的清心书院；法国天主教于1853年创办的明德学校；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1年创办的清心女子中学；天主教于1863年创办的圣芳济书院；美国传教士于1865年创办的培雅学堂和1866年创办的度恩学堂，两校于1879年合并成立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成为圣约翰大学；天主教于1867年创办的崇德女校；林乐知于1881年创办的中西书院，后来发展成东吴大学；日本人于1884年创办的东洋学馆；法国天主教会于1886年创办的中法学校；工部局于1890年创办的汉璧礼

西童男学和1892年创办的汉璧礼西童女学；美国浸礼会于1897年创办的桂秀女学，后称晏摩氏女校；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00年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等等。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和后来的维新派以及私人，也开始创办新式学校。当时较著名的是1862年在北京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当时比较著名的学校有：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5年创办的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71年创办的上海留美学生预备学堂；1874年创办的格致书院；1878年张焕纶创办的正蒙书院，后改为梅溪学校；1882年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1896年创办的育材书塾；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后演变为交通大学；1898年创办的务本女学和经正女学；1901年创办的澄衷学堂；1902年蔡元培等创办一个教育机关——中国教育会，该会创办了名为“爱国学社”的学校 and 爱国女学校；1903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后为外国传教士夺权，1932年发展为震旦大学；1903年创办的育才公学，等等。

1905年，清政府被迫宣布废科举、兴学校以后，新式学校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如1905年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后发展为复旦大学）；1907年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后发展为同济大学）；浦东中学堂；1908年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中国体操学堂；美国浸礼会创办浸会大学和初级道学院，后两校合并发展成为沪江大学；等等。

辛亥革命后，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在上海比较著名的学校有：1912年创办的大同学院（后发展为大同大学）、民国法律学校、女子工业大学、上海女子法政学堂、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神州大学、中华法政大学、三

育大学；1913年创办的南洋路矿学校、民国法政大学、哈佛大学；1914年创办的聂中丞华童学校、上海女子医学院；1915年创办的中华铁路学校、东吴大学法学院等。

在国内举办新式学校的同时，出国留学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清朝政府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起初只赴欧美留学，人数很少，在社会上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思想指导下，出洋留学的人数猛增。如1904年夏在东京的留学生人数，比1903年骤增一倍，比1902年骤增三倍。五四前夕，出洋留学人数达数万人。

五四运动前夕，据北洋政府教育部统计，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四百五十万人，学生数比1910年增长三倍。另据中华基督教教会调查团的报告，基督教教会学校学生二十一万余人；天主教教会学校学生十四万余人；私立学校学生一百〇四万余人。另据1916年《教务杂志》资料，俄国东正教教会学校学生六百八十余。此外，还有日本等国在中国办的学校。当时，全国共有学生（包括小学生）约五百九十万人。上海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二万五千余人。

这种新学校已不再象旧学校那样，专为科举服务，强制生员去搞那一套“义理、考据、辞章”的学问，充当求取功名的阶梯；而是系统地给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不再单纯灌输封建思想，而大大加强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因而学生的精神面貌、智能结构与活动方式，各校学生之间、地区学生之间以及国内外学生之间的联系，与旧学校的生员有了根本的区别。一个新的、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群体，终于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

中国现代的新式青年学生群体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青年学生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没有起码的民主自由。清政府所颁发的《卧碑》教规第八条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北洋政府的《治安警察条例》中也明确规定，青年学生“不得加入政治结社”。反动政府常常以“触犯政令”为借口封闭学校。军阀政府又往往挪用教育经费充作军费，任意克扣教职员工工资，使学校无法上课。教会学校里的清规戒律更多，动辄就对学生进行惩罚。这些赤裸裸的政治压迫，使血气方刚、政治敏锐、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难以忍受。特别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广大青年学生从现实生活中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性有了深切的体会，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

第二，多数青年学生虽出身于上层家庭，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军阀的野蛮掠夺，以及连年战乱，使整个民族经济走向破产，生产凋敝，民不聊生，学生的经济生活很不稳定，经常受着失学的威胁。即使毕业了，很多学生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1916年北京回国的留学生里有四分之一失业，其他毕业生的失业比例就更高了。这就使青年学生感到前途渺茫，不能不为摆脱这种困境而奔走呼号。

第三，青年学生大多掌握了一定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对社会的发展和各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们先是向往法国革命，后来逐步转向俄国十月革命。因而他们对旧中国的社会

弊病更加深恶痛绝，难以忍受，孕育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富有历史责任感。如二十年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条》的著作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天津南开读书的青年周恩来，在一首诗中写道：“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第四，当时我国大、中学校多分布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也集中着我国现代产业工人。上海是当时我国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最多的地方。同时，上海又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大本营，集中在上海的产业工人约占全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一左右。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密切配合和相互支持，大大启发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壮大了学生的组织，为进步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中国青年学生的这些特征，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斯大林曾经高度评价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的革命积极性。他说：“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必须注意，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33—334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

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学生运动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矛盾的一种表现，就是在学校中陆续爆发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学潮。南洋公学学生为了反对学校当局的封建压迫，一百多人高呼着“祖国万岁”的口号，愤而整队离校退学。在曾经轰动全国的“苏报案”中，当邹容死于狱中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学校的学生都秘密举行了追悼会。徐汇公学学生为反对传教士滥用体罚，三百余学生愤而退学。震旦学院爱国师生马相伯等，为抗议传教士的压迫，脱离震旦，成立复旦公学等等。这一时期，也已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学生运动。1903年4月，沙俄不仅不按照《东三省交收条约》的规定，从中国继续撤兵，反而向中国增兵八百，重占营口，并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要求，妄图一举吞并我东北三省，使之成为“黄俄罗斯”。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率先发起了拒俄爱国运动，许多学生自动组织“抗俄铁血会”、“东亚义勇队”、“关东独立自卫军”等团体，直接参加武装拒俄斗争。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会同各界爱国人士几百人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大会通电清朝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外交当局，表示坚决拒绝沙俄政府无理要求。我国留日学生得知消息后，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在留日学生激进分子组织

——青年会的带领下，召开了留学生大会。会议通过了组织拒俄义勇队等七项决定。他们以斯巴达人反抗波斯侵略者的故事激励自己，决心与沙俄侵略者决一死战。鲁迅先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在留学生大会后，很快译出了《斯巴达之魂》发表，激励拒俄斗志。留日学生的拒俄活动消息传到上海后，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决定响应留日学生的倡议，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

较大规模的学运，还有1905年爆发的反美爱国运动。187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到处出现声势浩大的大罢工。美国政府为了转移工人的斗争目标，进行排华煽动，并颁行限制华人条款。1894年清朝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以限制华工为内容的美中会订华工条约。这条约使华工受到的歧视和虐待变本加厉，甚至被剥夺财产，驱逐出境。1904年年底，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一致要求废除旧约，并反对续订新约。但美国坚持要清朝政府续订新约。于是人心愤激，群起反对。上海“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决定所有文具衣物概不用美货。美国人所办学校中的中国学生纷纷离校。清心书院、中西书院因此被迫停课。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抵制美货召开特别大会，宣称如不废除华工条约，要抵制美货到底。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接到上海抵制美货的通电后，立即联合各学堂，首先实行不购美货。该校爱国师生还广泛搜集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迫害华工的种种罪行，并开列美货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抵制美货。这一运动使当年美对华贸易锐减，并迫使美国政府和清朝政府未敢续订新约。

青年学生的这些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曾经引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注意。孙中山就曾经明确指出：“以学堂为鼓

吹之地”。他们还亲自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如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校，著名女革命家秋瑾曾主持校务。该校逐渐发展成为浙江一带的革命中心，全校学生几乎都加入了光复会，许多学生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青年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自觉地去领导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也未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帝制，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外夹攻下终于失败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秘密消息透露后，立即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中国留日学生两千余人召开了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坚决反对订立卖国条约。会上，公推留日学生李大钊为文牍干事。他负责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痛论亡国危机，号召“万众一心，抵抗侵略”。这篇通电传遍全国，有力地促进了反日爱国运动的开展。为了推动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留日学生五百余人回国，同上海学生一起，组织国民爱国社、对日同志会、同志救亡会等组织，开展爱国救亡运动。除了分散活动，还召开了三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通过抵制日货、拒绝日本无理要求的决议。决议很快得到天津、汉口等城市的响应，掀起了抵制日货高潮。留美学生也电请政府拒签亡国条约。当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生爱国运动。

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苏维埃政权诞生了。帝国主义极端恐慌，于1918年上半年开始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借此机会，代